

9-2006

北宋初年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以滿城會戰 (公元979)為例

Ruilong C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曾瑞龍 (2006)。北宋初年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以滿城會戰 (公元979)為例。《嶺南學報》，新第三期，67-9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3/iss1/5

This 專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北宋初年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 以滿城會戰(公元979)為例

曾瑞龍

香港中文大學

一、引言

在此新舊世紀交替之際，防禦在一個國家的戰略取向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和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不一樣，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着眼於「雙贏」，日益注重各種形式的合作妥協，而「非暴力」也可能成為未來國際間的行為規範。可是在妥協、防禦和攻略這三個大戰略取向中，防禦仍然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一環。妥協有可能失敗而演成流血衝突；弭兵論(pacifism)更不是萬應靈藥；攻勢戰略則太激進，容易悖離國際社會的規範。比較來說，防禦是切實可行，而又能應付各種變局的取向。現代戰略對防禦有很多嶄新思維，如平民防禦(civilian defense)的觀點，講求民眾以非暴力抗爭的形式，取代軍隊負起國防的重任。^[1]「非挑釁性防禦」(non-provocative defense)講求一種純粹的，不帶有攻擊手段的防禦形態，務求可以避免因戰備過急而發生「擦鎗走火」，衝突輾轉升級的危機。^[2]林林總總的另類防禦(alternative defense)，其辭彙足以構成一部辭典，^[3]就足以證明現代國家對防禦的注重。在這種趨勢下，歷史研究者也有可能需要進一步追尋並檢討古代的戰略經驗。

本文繼續探討筆者兩年前曾經撰文討論北宋對外戰爭中運用彈性防禦這個主題。該篇舊作觀察北宋致力追求彈性防禦的歷程和遭逢的問題，並以宋夏戰

^[1] Gene Sharp, *The Political Equivalent of War: Civilian Defens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65).

^[2] Anatol Rapoport, *The Origin of Violenc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onflict*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pp. 473-476.

^[3] Bjorn Moller, *Dictionary of Alternative Defense* (Boul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爭的案例為考察的重心。^[4] 本文承接前文，探討宋初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並以滿城會戰為個案。在長達二十五年的宋遼戰爭中，介乎高粱河（979年）和岐溝關（986年）兩大決戰之間存在一個戰略上的相持階段。這個階段主要由滿城會戰（979年）和瓦橋關（980年）之役構成。這兩場戰役，宋軍一勝一敗，雖然都只帶來戰術性結果，但前者反映宋軍主動展開彈性防禦的成功，後者則反成為不能從事彈性防禦而失敗的結果。在滿城會戰中，宋軍展現鮮明的野戰取向，以主力於正面接受會戰，而以一部分兵力迂迴敵後，發動夾擊。整個戰役構思表現出彈性防禦的形式。由於戰場的特殊地形影響，遼軍被擁進西山坑谷，造成相當的傷亡，但因宋軍機動力不足，遼軍遂得以暫時掩蓋。此外還有一個較重要的關鍵，即為了達到彈性防禦，而引致各支部隊之間的協調問題。協調之得解決便成為勝利的前奏。透過滿城會戰這個微觀個案，可以看出宋軍彈性防禦的戰略是如何構建，及其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何謂彈性防禦？

在傳統的戰爭年代，也就是還未出現核子戰爭的現代戰略防禦模式之前，防禦戰的形態可分為三種，就是前沿防禦 (forward defense)、縱深防禦 (defense in depth) 和彈性防禦 (elastic defense)。前沿防禦是思維最直接的一種防禦戰略，其要義是拒敵於國門之外。若國家的政治目的是保衛領土不受敵軍侵略，這是最簡捷的一種途徑。前沿防禦能相當直接地顯示出國家保衛領土的決心。中國古代的長城和羅馬帝國的長城都是前沿防禦的標誌。秦、漢和明代都企圖以長城這條堅固的防線，把國土與入侵者阻隔開來。^[5] 某些國家在地理上欠缺縱深，不得不把兵力分佈在前沿，也構成前沿防禦的動機。此外，軍隊的組織文化

^[4] 參曾瑞龍，〈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史叢》，3期（1998年12月），頁143-172。

^[5] 王國良，《中國長城沿革考》，壽鵬飛，《歷代長城考》，收入《長城研究資料兩種》（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再版）；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niel Schwartz,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張春樹，《漢代邊疆史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7年）。

(organizational culture) 也是某些國家奉行前沿防禦的因素，譬如伊莉莎伯·漆亞 (Elizabeth Kier) 在近年研究指出，兩次大戰間的法國就是由於三年兵役制轉型為一年兵役制，士兵的訓練不足以進行攻擊動作，故只能採取前沿防禦戰略。^[6] 不過說這是一種保衛領土的途徑，並不代表一定能成功地達到目的。前沿防禦在軍事上有很多缺點。它要求強化前沿陣地的抵抗能力，盡量減少漏洞的出現，其結果只能導致平均分佈兵力。若對方能集中優勢兵力於一點，就有可能突破守軍的堅強防線。更危險的是，遇到敵軍突破缺口之後進行大縱深進擊，切斷補給和交通路線，守軍就可能迅速崩潰。法國在1940年慘敗於納粹德國，就是前沿防禦失敗的最佳例子。法軍恃着馬奇諾防線 (Maginot Line) 堅不可摧，忽略了德軍集中兵力從阿登山地 (Ardennes) 大縱深突破的可能性，結果一敗塗地。^[7]

縱深防禦比前沿防禦優勝的是，它並不把主力分佈在前沿；相反，它組成防禦縱深，令敵人向國家腹地推進時受到持續的抵抗。這種持續的抵抗不僅是物質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成功的縱深防禦能令敵人體會到，佔領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這份體會的深刻程度也有可能改變敵人對侵略的看法，引起武裝勸止 (armed dissuasion) 的作用。況且，由於敵軍深入腹地，勢必影響百姓的生活，守軍在進行抵抗時將會受到百姓支持，因此必要時可以組織百姓進行抵抗活動，這就是為甚麼有時縱深防禦的戰略會和人民戰爭、游擊戰爭的概念相配合的原因。中國歷史上採用縱深防禦的例子不多，但也並非完全沒有，

^[6]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又見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4 (Spring 1995), pp.65-93.

^[7] B.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70), pp.65-86.

^[8] 姚從吾，〈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原載《大陸雜誌》，10卷9期 (1955年)，頁1-5，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1輯 (臺北：國立編譯館，1958年)，頁215-226；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編，《釣魚城史實考察》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1年)；陳世松、匡裕徹、朱清澤、李鵬貴，《宋元戰爭史》 (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135-155；李天鳴，《宋元戰史》 (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年)，頁430-446，518-520，723-726；胡昭曦、鄒重華，《宋蒙 (元) 關係史》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45-160，220-233。

南宋末年余玠(?-1253)守蜀，^[8]以及抗日戰爭時採用的焦土抗戰戰略都似乎可以看成縱深防禦的例子。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縱深防禦給予國際的弱勢社群對抗強權的決心，對國際安全帶來不少正面作用。可是真正有組織的縱深防禦不易進行，抵抗力量每陷入敵後成為孤島，冒喪失補給，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就算抵抗能成功地持續也很有可能演成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令作戰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即使在平時的狀況下，縱深防禦也有令人憂慮的一面。它假設國家隨時會遭受入侵，對於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很易帶來反面效應。過於急切的戰備也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因此，先進國家對縱深防禦常持保留的態度。況且，過於向民眾宣傳敵軍入侵的可能性會激生排外情緒，所以也可能會挑釁潛在的敵人。

彈性防禦與前沿防禦和縱深防禦不同之處，在於把保衛一個國家和直接保衛它的領土從概念上劃分清楚。彈性防禦的戰略認為一支軍隊不需要直接保衛國土，擊敗敵軍就足以達成保衛國土的目的。彈性防禦在戰略法上的特點是以一支能迅速調動的野戰力量為核心，尋找敵軍入侵時暴露的破綻加以反擊，其具體手段包括迂迴、遮斷(interdiction)、夾擊、包圍等。彈性防禦又稱為機動防禦(active defense)，不過在現代戰爭中「機動」有時是「機械化」的代義詞，一旦將它使用在古代戰爭中，容易引起混淆，不如用彈性防禦一詞意義明確。彈性防禦不要求人民無限量的支持，也毋須冒家園糜爛的風險，但強大的野戰力量，適當的縱深，和各部隊之間的高度協調，務求步調一致，是進行彈性防禦的必要條件。^[9]

彈性防禦的構想符合二十世紀戰略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 1895-1970)對「間接路線戰略」(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的詮釋。李德·哈特認為從特洛伊(Troy)到「六日戰爭」(The Six-Day War)，大部分決定性會戰的勝利都是由間接路線戰略達致的，亦即先顛覆了敵軍的平衡，然後再實施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10] 李德·

^[9] 有關前沿防禦、縱深防禦和彈性防禦在現代戰爭中的取捨，參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13-155; Goetz Sperling, *German Perspectives on the Defense of Europe: An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NATO Strategy*, National Security Series no. 1/85 (Kingston, Canad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1985), pp.19-20, figure 4-5; Stanley M. Kanatowski, *The German Army and NATO Strategy*,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onograph Series 82-8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0-16.

^[10] B.H. Liddell Hart, *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 (London: Faber & Faber, 1946), preface, i-iii.

哈特認為：

沿着敵人自然期待的路線採取行動，結果足以鞏固敵人的平衡，因而也增強了他的抵抗力量。戰爭也和摔角一樣，假使不先使敵人自亂步驟和自動喪失平衡，而企圖直接把敵人弄翻，結果只會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用力愈大則輸得愈慘。……在多數戰役中，首先使敵人在心理上和物質上喪失平衡，常常即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11]

當這個原則用在防禦戰上，就構成不直接保衛領土，而儘量集結野戰部隊進行機動戰，尋找機會切入敵軍弱點的戰役法。

在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隆美爾(Erwin Rommel, 1891-1944)的「戰斧」、「十字軍」和賈札拉(Gazala)之役，李德·哈特力讚隆美爾運用機動戰法從事防禦，並認為他從阿拉曼到突尼斯長達二千哩的撤軍，「在軍事史上要算是最傑出表演中的一個，……這種『色羅奉』(Xenophon古希臘傭兵)式的偉大成就，在近代似乎是頗難找到第二個。……足以證明近代化的防禦，若能作巧妙的運用，其所具的抵抗潛力可以大到極點。」^[12]雖然德在撤回突尼斯之後因希特勒的干預而改採前沿防禦，但這無礙於李德·哈特對隆美爾的高度評價。曼斯坦元帥(Erich von Manstein)也是一位彈性防禦的老手，他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撤退時所採用的「蛙跳」(leap-frog)式退卻，以及卡爾科夫(Kharkov)會戰都表現出集中野戰力量靈活調動的特色。^[13]李德·哈特稱讚曼斯坦在俄軍佔領卡爾科夫，並挺進到第聶伯河(Dnieper)的大河灣時，並沒有動用預備隊直接作河川防禦。相反，他任由俄軍的補給線延長，然後再用裝甲部隊反擊，打在俄軍的前後接頭位上。這一擊使俄軍一共損失六百輛戰車和一千門火炮，德軍還重奪了卡爾科夫。^[14]這次勝利印證了一個彈性防禦的信念：隨着敵軍的殲滅，領土的易

^[11] 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戰略論：間接路線》(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24。

^[12] 李德·哈特，〈《戰略論》〉，頁350。

^[13] Erich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y* (London: Methurn and Co., 1958), pp.371-413, 428-437. 中譯本，曼斯坦著(鈕先鍾譯)，《失去的勝利》(臺北：臺北軍事譯粹社，1984年)，頁305-343，359-365。

^[14] 李德·哈特，〈《戰略論》〉，頁326；B.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p.482-483.

手也將是必然的結果。當然，李德·哈特的斷言是將包含彈性防禦在內的所有間接路線戰略當作一個客觀真理來看，而本文則只強調其作為歷史條件的產物。

在古代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說明即使未經過理論化的提煉，實戰經驗也可以直接累積成為軍事信念 (military doctrine)。拜占庭皇帝尼契科洛二世 (Nikephorus II Phokas or Nicephorus II Phocas, 912-969) 口述的《前哨戰》(Skirmishing) 一書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前哨戰》的執筆者宣稱此書不但是尼契科洛二世戎馬生涯的結晶，也綜合了其父祖累代將略。^[15]《前哨戰》鼓吹彈性防禦的觀點，認為守軍應誘敵深入，令敵軍疲敝，然後才切斷敵軍退路，展開殲滅戰。執筆者強調這些信念的來源是尼契科洛本人及其父祖的實戰經驗，並在第二十節舉出尼契科洛的祖父霍卡斯 (Phocas) 在約900年的亞丹那 (Adana) 戰役為例。當時薩拉遜人正深入安那多里亞 (Anatolia)，霍卡斯把抵禦的任務交給安那多里亞和鄂布西斯安 (Opescian) 兩鎮，自己親率各鎮援兵和直屬團隊殺入西里西亞 (Cilicia)。^[16]他在亞丹那城外擊敗一支敵軍，於是沿海長驅，焚略而還。作者又概括地指出安那多里亞和卡珀多西亞 (Capadocia) 一帶有不止一條道路通往塔瑟思 (Tarsus) 方向，不管敵軍從哪一條路上入侵，拜占庭軍隊都可以立即取另一條道路反擊。他又指出邊境重鎮賴根多斯 (Lykandos) 的主將曾經多次在遭受入侵之時，向安提阿 (Antioch) 和亞勒坡 (Aleppo) 方向發動反擊。^[17]這些戰例都顯示出，拜占庭的彈性戰略防禦存在一個從實戰中逐步結晶為概念的過程。

在彈性防禦的模式當中，由於主力部隊具備較雄厚的野戰能力，因此必要時也可以展開先制攻擊 (preemption)。基於這一點，亞萊斯特·伊恩·莊士東 (Alastair Iain Johnston) 認為「防禦」很多時候是一種飾詞。彈性防禦與攻勢作戰的分別很微，採用機動防禦其實也可能潛在攻擊取向。他指出明代對蒙古進行的機動防

^[15] Nikephorus II Phokas (912-969), *Skirmishing*, in George T. Dennis, *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85), pp. 127-140; Warren Tre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 284-108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4-35.

^[16] 這裏的西里西亞指的是安提阿附近沿海地區，和近代德國的西里西亞 (Silicia) 無關。

^[17] Dennis, *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220-221.

^[1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51-153. 又見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16-268.

禦和毛澤東思想中的運動戰元素，都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攻擊性。^[18] 這種意見頗有啟發性，但還需要詳細研究其和戰略法 (operational art) 和大戰略 (grand strategy) 這兩個不同戰略層次的關係，^[19] 觀察兩者是否必然存有相同的取向，以及萬一出現違異的時候如何協調，才能下定論，否則很容易便會出現「在自己領土上對別人進行侵略」的荒謬情況了。^[20]

三、宋初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

戰略的形成有賴理性的思考，諸如戰場的廣袤、交通線的疏密、兵種的構成都成為這種理性思考的要素。可是所謂理性的詮釋，在不同文化中帶有相對性，而理性決策也容易受到軍事信念 (military doctrine) 的影響。所以在戰略的構建過程中，理性和文化、習俗、價值觀的取向常常交互出現，形成一個互動的平臺。^[21] 在宋代來說也不例外，戰略並非純粹理性的產物，而是與各種觀念和規範息息相關的。

首先需要指出，前沿防禦在宋初本來具有明顯的發展空間。宋人注重內部整治，似乎容易體認到透過一條堅固的防線，把國土與入侵者阻隔開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錢若水 (960-1003) 便曾提出前沿防禦的構思，認為「來則掩殺，

^[19] 關於戰略法的研究，參Edward Luttwak, *Strategy*, pp.260, footnote 1; Clayton R. Newell, *The Framework of Operational Warfa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B.J. C. McKercher and Michael A. Hennessy, *The Operational Ar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ies of War*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6); Simon Naveh, *In Pursuit of Military Excellence: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1997). 關於大戰略，參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p. 335-336; John M. Collins, *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

^[20] Joseph W. Esherick (周錫瑞) 對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的書評，刊於*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1997), 56: 3, pp.769-771。

^[21] 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Katzenstein,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pp.1-32;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Katzenstein,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pp. 33-75.

^[22] 脫脫等，〈錢若水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冊26，卷266，頁9167。

^[23] 〈張洎傳〉，《宋史》，卷267，頁9209；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簡稱《長編》)，卷30，頁666。

去則勿追」，^[22] 端拱初年，契丹寇邊，張洎 (933-996) 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為要略」。^[23] 田錫 (940-1003) 認為「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眾，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而謀遠也」。他強調「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24] 可見前沿防禦能營造一個安全空間，合乎農業社會的基本利益。

事實上，宋太祖開國初年似乎曾經一度屬意於前沿防禦。范鎮 (1008-1089) 稱：「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箠椎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25] 可是宋太祖一朝，宋遼戰爭從未全面爆發，諸將所應付的可能只是契丹日常的抄略。至於北漢和黨項，對於宋的邊防都沒有很嚴重的威脅。因此，這是一種實際上行之有效的戰略，抑或只反映一種純粹防禦的理念，仍有待深入探討。

本來興築長城是達到前沿防禦的直接手段，宋代卻沒有築長城的理念。客觀上，遼和西夏都屬於所謂「征服王朝」，對中國的典章文物、城邑之制殊不陌生，有比較明確的領土觀念。宋人若有所興作，即使築一城一寨，疏浚濠溝，也很容易「起釁召戎」，而未竟全功。主觀方面，宋人廣泛地宣揚「恃德不恃險」的論調，認為地理上的界限不足以為王朝提供安全的保障，因此對於興築長城之類的前沿防禦戰略並不重視。^[26] 最根本的原因，是宋人認為不值得付出鉅大的人力物力，導致王朝的社會基礎發生動搖。例如宋太宗端拱二年 (989年)，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樊知古奏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革三百萬。太宗不以為然，說：「萬里長城豈在於此？」「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27] 朱台符也批評：「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絕大漠而海內虛，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商鑒不遠也」。^[28] 值得注意的是，前沿防禦和戰略攻勢本應是不同的戰略取向，可

^[24] 《長編》卷 22，頁 498-499。

^[25] 范鎮，《東齋記事》，與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標點本），卷 1，頁 1。

^[26] 江天健，〈北宋陝西路沿邊堡寨〉，收入氏著，《北宋對西夏邊防研究論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年），頁 9-42。

^[27] 〈樊知古傳〉，《宋史》，卷 276，頁 9395。

^[28] 〈朱台符傳〉，《宋史》，卷 306，頁 10102。

是在朱台符的眼中，築長城和絕漠進擊都不過是一逞人主意欲的事情。這個問題也可以提升到風險的角度來理解。無論彈性防禦還是築長城都要承擔風險。彈性防禦所要承擔的是戰鬥風險，軍隊可能在野戰中被擊敗。築長城所要承擔的是社會不安，民心思變。可是北宋的統治者寧可選前者而不願擇後者，這種對風險的選擇正反映了文化的取向。

五代的對遼戰爭展現着強烈的野戰取向。和東晉南朝主要採用堅壁清野的歷史經驗不同，後唐和後晉的軍隊抵抗契丹主要都寧願承擔野戰風險，而甚少倚恃堅城。這種取向的文化根源可能和五代軍隊中存在一定數量的沙陀人和其他各種胡人有關。早在晚唐時，李克用(856-908)率沙陀軍破黃巢(?-884)，繼而爭霸中原。其子後唐莊宗李存勳(885-926)繼承沙陀軍，後來在征戰期間不斷收編蕃、漢部隊，冠以內外蕃漢馬步軍種種名號。其中最精銳的「橫衝軍」名將李嗣源(867-933)，藉兵變得位，手下名將如石敬瑭(892-942)、藥彥稠、康義誠等亦為胡人。^[29]石敬瑭和他的部將劉知遠(895-948)後來分別建立後晉、後漢二朝，都出自這個系統。

更加重要的是，五代軍隊的野戰取向曾經帶來不少戰果，足稱為成功的軍事經驗。後唐時王晏球圍定州，曾以符彥卿(898-975)、高行珪(885-952)左右夾擊為契丹先鋒的王都，「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又再破契丹於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30]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4年)，景延廣(892-947)曾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似乎具有縱深防禦的意圖，但很快出帝就打破這個規定，親自率兵往威城救符彥卿和高行珪。^[31]其後出帝還親自和耶律德光(902-947, 927-947在位)周旋於澶州，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兩軍「互有勝負」，「帝亦出陣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32]在同年的馬家口之戰，正在渡河的契丹軍隊遭到後晉兵反擊，「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33]陽城之戰，雙方反覆進退，雖然約八萬的契丹軍一度包圍了晉軍大陣，但剛好遇到風沙，晉兵

^[29] 歐陽修，〈晉高祖紀〉，《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8，頁77；〈藥彥稠傳〉，《舊五代史》，卷66，頁880；卷66，〈康義誠傳〉，頁879。

^[30] 歐陽修，〈王晏球傳〉，《新五代史》，卷46，頁510。

^[31]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284，頁9266。

^[32] 《資治通鑑》，卷284，頁9268。

^[33] 《資治通鑑》，卷284，頁9266。

^[34] 《資治通鑑》，卷284，頁9290。

逆風而戰，一時攻其無備。符彥卿「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34]這些例子都可見後晉禦契丹不乏成功的戰例，其要義是集中主力機動作戰，隨着敵軍主攻方向而調節正面，捕捉敵軍弱點，策動反擊而致勝。這種經驗融會在宋琪(917-996)的軍事信念當中，正如他在雍熙三年(986年)所作的檢討，「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不曾奔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35]後晉最後敗於契丹，主要是杜重威(?-948)變節的結果，和戰略的關係不大。

北宋從五代繼承強烈的野戰取向而總結出彈性防禦的模式，是很自然的發展。北宋繼承五代的職業兵制，具備一支常備軍，遂可提供彈性防禦所必不可少的野戰力量，沒有臨時點集農民，欠缺校閱的毛病。以往史家詬病募兵制度帶來士兵良莠不齊，作風驕惰，訓練不足等等問題，認為不及唐代府兵制度為可靠，且導致宋代的積貧積弱。^[36]可是隨着近年唐史研究的日趨深入，府兵的優越性已漸漸失去取信能力。史家逐漸相信，府兵並非唐代與邊疆民族長期戰爭的主力，其為驍果、健兒及各種形式的常備軍所取代，不但合乎專業化的趨勢，也是隋唐之際很早期就發生的轉變。^[37]宋代募兵良莠不齊，作風驕惰，訓練不足，到底屬於募兵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問題，還是執行上的人為偏差令組織不夠健全，看來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38]至少在宋初來說，禁軍還是相當強勁的。「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39]韓琦(1008-1075)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則募置，事已則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40]無論如何，宋代的兵制保證有一支長期在役的野戰力量，對於採用彈性防禦的戰略是正面因素。這一

^[35] 《長編》，卷 27，頁 607。

^[36] 鄧廣銘，〈北宋的募兵制度與當時積貧，積弱和農業生產的關係〉，《中國史研究》，1980年4期(1980年12月)，頁 61-77。

^[37] 早期持這種觀點的有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201-225。近年有黃永年，〈對府兵制所以破壞的再認識〉，《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4期(1997年12月)，頁 253-268；孟彥弘，〈唐前期的兵制與邊防〉，《唐研究》，1期(1995年12月)，頁 245-276。此外，尚可參考張國剛，〈唐代府兵制度淵源與番役〉，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1-28。

^[38] 羅球慶，〈北宋兵制研究〉，《新亞學報》3卷1期(1957年8月)，頁 167-270，認為軍隊戰鬥力的低落是制度動搖的結果，而非當初原意。

^[39] 〈兵一〉，《宋史》，卷 187，頁 4569-4570。

^[40] 〈兵一〉，《宋史》，卷 187，頁 4575。

點至少可以認定。

從戰場地理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宋初為何採用彈性防禦。自石晉失去燕雲，北方的國防線似乎不大適合進行前沿防禦。自白溝河迤東以至滄州，地形低窪，不適合騎兵進出，後來宋軍在此基礎上經營塘水，構成一道天然防線，是較易達前沿防禦的地段。^[41]西路河代州有雁門之險，受太行、呂梁山脈的屏蔽，也比較易守難攻。有問題的是整條防線的中央地段，即易州、滿城、遂城、保塞等處，適合進行哪一種防禦模式，頗為值得研究。過去的研究喜歡強調這一段中央戰線是契丹騎兵如入無人之境的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契丹騎兵大舉進出深、祁，直扣唐河，是易州、滿城一線在端拱二年失守，^[42]保州、威虜軍、遂城、唐興口同時受到威脅的結果。端拱二年以前，易州作為戰線的突出部，對徐河、唐河有屏蔽作用。更為值得指出的是，由於這條戰線一左一右都是不容易進攻的地段，遼軍的攻勢多半會從中央地段發起，帶有很高的可預期性(predictability)。事實上自979年至1004年，遼軍總共對河北發動過十次大規模入侵，除了瓦橋關之戰(980年)和雄州之戰(995年)外，^[43]其餘八次全部是從中央戰線發起的。^[44]基於這一點，宋軍可以預先加以部署，主動地組織防禦。沈括(1031-1095)就曾指出這個地段的西部，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宋軍是可倚西山佈陣，另以奇兵設伏，出奇制勝的地方。^[45]

在前沿防禦、縱深防禦和彈性防禦三種戰略當中，北宋人傾向採用以彈性防禦為主，而因應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徵，配合其他兩種防禦的戰略。在宋遼和宋夏戰爭中，宋人在大部分戰例中都致力運用野戰部隊與敵周旋，務求運用設伏、迂迴、遮斷、夾擊等戰術擊敗對手。宋軍通常在定州唐河設大陣，會合鎮、定、高陽關三路屯軍。在宋遼戰爭初期，宋軍的陣勢還比較簡單，多數作前後

^[41] 〈河渠五〉，《宋史》，卷95，頁2358。

^[42] 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收入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刊》(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年)，頁1-19。

^[43] 關於雄州之戰，參〈太宗紀二〉，《宋史》，卷5，頁97。

^[44] 指滿城會戰(979年)、唐興之戰(982年)、君子館之戰(986年)、唐河之戰(988年)、徐河之戰、高陽關之役(999-1000)、望都之役和澶淵之役(1004年)。有關史料分別見《長編》，卷20，頁462；卷23，頁521；〈聖宗紀二〉，《遼史》，卷11，頁126；《長編》，卷29，頁657-658；卷30，頁682-683；卷45，頁971-972，卷46，頁985；卷54，頁1190；卷57，頁1265。

^[45]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兵28之16。

兩重陣。據《武經總要》所載，一組縱深梯次的方陣包含步騎十餘萬人，大陣「常滿十萬人」，前後分別有約三萬騎組成的前陣和約兩萬人組成的後陣，加以掩護，左右兩翼各有拐子馬陣。這相信反映宋真宗時代的情況。^[46]前陣之前一段距離，還有主要是騎兵組成的先鋒陣和策先鋒陣。他們負擔與敵游鬥，「深入以牽其勢」，「撓其心腹」，伺機「腹背縱擊」的任務。^[47]只有在眾寡懸殊，或新經重創之後才會閉壁自守。這種戰略雖曾帶來可觀戰績，如滿城會戰、雁門之捷和羊山之捷等，^[48]但也遭遇指揮權欠集中、協調不足或未能高度集中兵力等問題。軍隊中騎兵比例不高，影響機動力，也是一個主要的漏洞。

戰馬的不足是進行彈性防禦的首要問題。前人指出宋軍戰馬數量不及契丹，是北宋對遼戰爭未能取得決定性勝果的原因，^[49]這項論斷原無錯誤。可是也要指出的是，戰馬的問題也應該放進彈性防禦的框架裏討論。前沿防禦或縱深防禦這兩種防禦模式都不要要求進行大規模機動戰，對馬匹的需求未必很殷切。正因為北宋採用的是彈性防禦，需要進行機動戰的可能性很多，馬匹才顯得重要。在一個八萬人以上的宋軍大陣中，騎兵的比例不到一半，這使大陣的機動能力顯得有限，而騎兵也很想擺脫步兵的羈絆。^[50]在澶淵之役，王超指揮的大陣就未能給予親征部隊快速的支援。^[51]可是宋軍的騎兵也不是毫無戰績可言，雁門之役(980年)楊業(?-986)麾下的騎兵，以及羊山之役(1000年)的幾支宋軍騎兵部隊都能重創以騎兵為主的遼軍。^[52]總之，在彈性防禦的處境中，配合對出擊時機的討論比單純用兵種來分析勝負更為恰當。

另一個是指揮權限的問題。彈性防禦要求一體化的指揮系統，令不同的部隊在進退、迂迴、伏擊的時候能作有機的協調，而不致為敵人逐個擊破。正如曼斯坦所說，「使各級指揮官都盡量保有主動和自足的範圍」，是一項領導原則。^[53]宋太祖以郭進(922-979)控西山，李漢超(?-977)鎮關南，執行的好像是前沿防禦而非彈性防禦，不過以指揮權限來說，則頗能做到使指揮官保有充分的權限。

[46] 曾公亮等輯，〈本朝常陣制〉，《武經總要前集》，收入《中國兵書集成》，冊3-5(瀋陽：解放軍出版社、遼瀋書社，1988年)，卷7，頁311-319。

[47] 《長編》，卷54，頁1195-1196；卷57，頁1266；卷58，頁1275，1277。

[48] 關於羊山之捷，參王曉波，〈宋真宗對遼戰爭考之二：遂城之戰〉，《宋代文化研究》，9期(2000年)，頁236-246。

[49] 金毓黻，《宋遼金史》(臺北：樂天出版社，1972年)，頁32。

[50] 《長編》，卷58，頁1277。

[51] 《長編》，卷58，頁1281。

[52] 《長編》，卷20，頁473；卷50，頁1082-1083。

[53]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y*, pp.382. 曼斯坦，《失去的勝利》，頁315。

不過從太宗開始，則逐步削除邊將特權，以致出現田錫所說「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的情況。^[54]各級的指揮官欠缺充分權力去協調各單位的行動，對敵軍入侵的反應就不可能保持彈性，其流弊之甚，乃出現以陣圖來指揮的局面。

可是對這一點過分強調，也可能會看不到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君主透過限制武將的作戰手段，來養成一種唯命是從的組織文化，的確具有君主專制的意圖。然而在承認這一點的時候，也應該看到過度限制武將的作戰自由，與君主的利益並非完全符合。一旦君主作出的指引不合乎戰場的實際情況，它遭到變更，是很大程度上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只有打勝仗，或至少避免一場主要的軍事失敗，才合乎統治者的最終利益。下文將會說到滿城會戰中，大將趙延進認為「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矣。……違令而獲利，不猶於辱國乎？」^[55]就道出了這重意義。

事實上，君主控制武將作戰手段這個意圖與現實存在多大距離仍然是不可忽略的一環。大量例證說明，宋軍最終的戰術動作不一定由方略和陣圖所決定；相反，臨戰時所舉行的軍事會議是進行最後拍板的場合。滿城會戰本身是一個重要例子。宋軍將領在會議中推翻了宋太宗的陣圖，變陣出擊而獲得大勝，是一項重要的軍事決定。同樣，曹彬(931-999)在第二次經略幽燕時，「而彬所部諸將聞(潘)美及(田)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56]眾所周知，這項決策直接導致了歧溝關之敗。可是鮮為人提及的是，這條史料同樣說明了軍事會議的決定，才是最後影響行動的方案。在陳家谷戰役前的會議中，楊業提供的佯攻應州的方案被否決，改為直取馬邑，也是成敗的關鍵。^[57]同樣，唐河之戰前，宋太宗本來曾下詔固守壁壘，可是在軍事會議中，李繼隆(950-1005)和袁繼忠卻決定出戰，認為「閩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也說明最終的決定是由軍事會議作出的。^[58]換言之，宋初軍事行動的機制除了君主集權之外，還存在另一條解釋線索，就是軍事會議上如何達成協調。如果軍事協調得到諸將的共識，又能大力推行，那麼作戰多半會較為順利，否則很容易招致失敗。協調的需求

^[54] 《長編》，卷 30，頁 675。

^[55] 《長編》，卷 20，頁 462；〈趙延進傳〉，《宋史》，卷 271，頁 9300 略同。

^[56] 《長編》，卷 27，頁 612-613。

^[57] 《長編》，卷 27，頁 621-622。

^[58] 《長編》，卷 29，頁 657-658。

在宋軍採用彈性防禦的背景下顯得更為迫切。在機動作戰中，不同單位的協調更是成敗關鍵。

總的來說，北宋對遼的彈性戰略防禦既表現為一種理性思考，也表現為一種組織文化。作為一種理性思考，彈性防禦配合了宋人所擁有職業兵的硬件，以及戰線中央地段的複雜形勢。職業兵提供了彈性防禦所必不可少的野戰力量，而戰線的中央地段則具有不少伏擊，迂迴的空間，這些都可以為宋人之所以實行彈性防禦下了很好的注腳。可是宋人並不具備施行彈性防禦的一切條件。宋軍擁有尚算合比例的騎兵部隊，但整體而言，野戰部隊反應的速度有被步兵拖慢的跡象，對於大縱深作戰來說有很大顧慮。這也很可能是宋軍雖然以彈性防禦為指導方針，但常常不敢制訂大縱深作戰方案的原因。此外，宋太宗經常對前線指揮進行干預，指揮官能否根據敵情作出靈活敏銳的反應要視乎軍事會議能否達到協調的共識，而這項決策又能否被有力地推行。彈性防禦在宋遼戰爭期間能否發揮威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項關鍵因素。

雖然從理性角度來看，宋人不具備施行彈性防禦的理想條件，但我們還是要考慮到戰略除了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外，它還作為一種組織文化而存在，經驗、習俗、慣例和信念都是戰略形成的因素。^[59]我們不可低估五代抵禦契丹的成功經驗對宋人所產生的影響。如果我們考慮到宋初的軍隊在若干程度上是五代軍隊的延續，那麼它採用相沿習用的戰略就不足為奇了。

四、個案研究：滿城會戰

將滿城會戰當作宋代一項戰術成就的標記，目前還沒有太多的論述。和唐代不一樣，宋軍沒有優勢的騎兵，在擊敗敵人以後不容易透過追擊來擴張戰果，因此很少戰役能獲得上萬首級。滿城會戰中，宋軍斬首一萬三百級，俘虜數萬人，在宋代而言已是戰果非常突出的戰役。是役宋軍運用了彈性防禦的方針，集中兩個野戰部隊在正面，同時以另一個部隊切入敵後，在機動戰中獲得很大的成功。這場勝利說明了宋太宗在戰役上的協調必不可少，但卻難以遙距干預戰術的運作。

^[59] 有關軍隊組織文化的定義，見 Elizabeth Kier, *Imaging War*, pp.4, 27-30; 又見 Jeffrey W.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7-29.

滿城會戰發生於979年，是緊接着高粱河戰役而發生的。當宋兵從幽州敗退之後，遼為了報復，就在年底大舉南侵，於是發生了滿城會戰。^[60]遼廷為了這次南侵作了一番準備，命宿將燕王韓匡嗣做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惕隱耶律休哥(?-998)、南院大王耶律斜軫(?-999)、權奚王耶律抹只各率本部兵從征。^[61]遼軍主力指向滿城，另有一支別動隊，在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的指揮下向河東作牽制性攻擊。^[62]遼軍入侵的規模，據《宋史》〈崔翰傳〉記載有數萬騎，但不知是指全軍的總數，還是僅就前軍的數目而言。^[63]《遼史》〈兵衛志〉有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以上記載也指出在不命都統的情況下也會派出騎兵六萬。^[64]從任命韓匡嗣做都統的跡象看來，遼軍入侵的規模有可能達到十餘萬人的層次。

遼軍越過易州，到達徐河以北的滿城，就遇上了前來迎戰的宋軍。宋軍的實力，據記載有八萬之多。^[65]這個數字在宋方記載中僅一見，但如考慮到宋軍平太原曾動員十多萬軍隊，^[66]跟着立即進攻幽州，然後減去高粱河一役的損失，及隨太宗返京的護從禁衛，宋軍留在前線的軍隊是可達八萬之譜的。以上八萬大軍只是在徐河正面拒戰的主力。在右翼，宋關南屯軍正以迂迴的路線向遼入侵軍的側後方進逼。這一路的兵力未知多少，但若有一、二萬的話，宋軍投入的總兵力將會達到十萬人以上。總之，在滿城會戰前夕，宋軍是集結了相當可觀的兵力。

滿城屬古代督亢之地，多山谷，易守難攻。戰國時燕太子丹以獻督亢地圖，替荊軻刺秦王製造機會，此點對其地形之複雜可做一注腳。遼軍背靠西山坑谷，古稱「天陷」之地。按《滿城縣志》所載，在民國初年，此地連馬車通行都時有困難。「滿城西境多山，運載往來，率用馱騾，遠山之地，則用車馬」。^[67]遼軍的前面是徐河，雖不是甚麼戰略屏障，但足可界限騎兵的戰術動作。宋人在

^[60] 脫脫，〈耶律休哥傳〉，《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83，頁1299云：「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

^[61] 〈景宗紀下〉，《遼史》，卷9，頁102。

^[62] 〈景宗紀下〉，《遼史》，卷9，頁102。

^[63] 〈崔翰傳〉，《宋史》，卷260，頁9027。

^[64] 〈兵衛志〉，《遼史》，卷35，頁399。

^[65] 〈趙延進傳〉，《宋史》，卷271，頁9300。

^[66] 曾鞏，《元豐類稿》(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49，葉2下。

^[67] 陳昌源等纂，陳寶生等修，《滿城縣志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卷8，頁253。

此集結重兵，遼軍前後進退就都有問題。反而宋軍後方開闊，通向鎮、定二州的道路不受威脅。後來劉廷翰(923-992)先搶佔徐河橋頭陣地，讓李漢瓊(927-981)、崔翰(930-992)等有充分時間展開部隊，就利用了以上地形的特性。加以宋人沿着古燕、趙長城設有不少城寨，戰場附近滿城，及其以東約七十里的遂城，都是宋軍的據點，這一帶後來成為宋遼反覆爭奪的戰場，實在不是偶然的。遼人自周世宗時失了三關後，不能自由進出關南，從滿城入侵遂成為可以預料的途徑。傳統史家謂宋遼邊界無險可守，實多指988年以後遼人吞去易州——滿城突出部，而令徐河防線長期暴露，保塞、唐興、長城口同時受到威脅的形勢。然而979年易州——滿城突出部尚在宋人手上的時候，實不能不承認宋人仍具有憑藉戰場地形展開兵力的機會。

宋軍首先到達徐河搶據灘頭，展佈兵力的是鎮州都鈐轄劉廷翰。^[68]徐河在定州北方，但劉氏比駐軍定州的大將崔翰來得還要早。當劉部先佔橋頭陣地時，遼軍的先頭部隊大概也在作同樣打算。誠然，大部分史料都偏重記載後來的主戰鬥，而忽略了爭奪橋頭陣地的序戰，但《宋史》〈丁罕傳〉揭示出雙方開始時就在橋頭接戰，丁罕(?-999)在劉廷翰指揮下奪橋有功，使後續部隊能順利展開，也是導致勝利的一個契機。丁罕戰後從所屬部隊的指揮使遷為都虞侯。^[69]橋頭初捷，由崔翰、李漢瓊指揮的鎮、定二州屯兵源源抵達，八萬大軍雲集徐河之上，大戰已一觸即發了。

可是這八萬宋軍由誰指揮？第一個可能的指揮官是崔翰。《宋史》〈崔翰傳〉是提出這種看法的主要依據。據其記載指出，太宗很賞識崔翰在幽州撤退時表現的鎮定自若和有條不紊，因而命其知定州，「得便宜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史文下面又提到遼軍入侵時，「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70]《宋史》〈趙延進傳〉也提到崔翰打算根據太宗頒下的陣圖佈陣，「翰等方按圖佈陣」，^[71]彷彿他就是主帥。《宋史》〈李繼隆傳〉記述參與戰役的將領時，也特別標出崔翰的名字。^[72]

可是負責擺陣，卻不一定非主帥不可。五代及北宋初年的軍隊曾在都部署

[68] 劉廷翰的姓名，《長編》作劉延翰，今從《宋史》。

[69] 〈丁罕傳〉，《宋史》，卷275，頁9377。

[70] 〈崔翰傳〉，《宋史》，卷260，頁9027；《長編》，卷20，頁462同。

[71] 〈趙延進傳〉，《宋史》，卷271，頁9300；《長編》，卷20，頁462同。

[72] 〈李處耘傳附子繼隆傳〉，《宋史》，卷257，頁8964。

之外專設「排陣使」，就反映了這個事實。趙延進和李繼隆的傳上提到崔翰，可能僅在於他們反對其按圖佈陣，而不必一定由於崔翰是主帥。相反，在《宋史》〈孟玄喆傳〉裏，孟玄喆(938-992)與「軍器庫使藥可瓊，深州刺使念金縵，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侯崔翰，四方館使梁迥，翰林使杜彥圭帥兵屯定州」。^[73]在前引的史料中，崔翰的名字卻被混排在一群軍官的名單中，看不出有甚麼顯要。更強力的反證，是《長編》中太宗的指令，「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軍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74]那麼，得以便宜從事的便不只崔翰一個，李漢瓊和崔彥進也都具有同等權力，連一起屯於定州的孟玄喆也榜上有名。換言之，單在定州方面，連誰指揮誰，也好像都成了問題。難怪在〈孟玄喆傳〉中竟有點將崔翰說成一個普通軍官的語氣了。

擔當戰役指揮官的另一個可能人選是劉廷翰。《宋史》〈太宗紀〉提到滿城會戰時，就大書「劉廷翰破敵於徐河」，而不提及崔翰。^[75]《宋史》〈崔彥進傳〉也把劉廷翰名列在崔翰之前。^[76]事實上，劉廷翰在戰勝後就由雲州觀察使遷大同軍節度使、殿前都虞侯，本傳上明言是由戰功超卓之故。^[77]

不過視劉廷翰為主將也有許多不妥。他當時與李漢瓊同屯兵鎮州，以其鎮州都鈐轄的權限，似應可節制只是鈐轄的李漢瓊，^[78]但對於定州和關南的屯軍，就看不出明顯的統屬關係了。再加上前引《長編》中得以便宜行事的四員大將中也沒有他的份兒，實在是一大疑團。若以上的記載無誤，他的作戰權限反不如李漢瓊。因此，在鎮州屯軍中，和定州一樣，誰指揮誰也是搞不清楚的。

李燾(1115-1184)對於特別錯綜歧異的史料，常能運用史筆作出巧妙的綜合，使其看去不致發生明顯的衝突。滿城會戰便是其中一例，《長編》的行文如下：「契丹大入侵，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延(廷)翰帥眾御之，先陣於徐河……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79]他標明劉廷翰作為主帥，只是崔翰和李漢瓊未抵戰場時的事，往下去究竟誰來指揮，就沒有加以論斷了。我們如過分調合上述歧異的記載，與其硬說劉廷翰是主帥，抑或屈居李漢瓊之下，不如承

^[73] 〈孟玄喆傳〉，《宋史》，卷479，頁13882。

^[74] 《長編》，卷20，頁458。

^[75] 〈太宗紀一〉，《宋史》，卷4，頁63。

^[76] 〈崔彥進傳〉，《宋史》，卷259，頁9006。

^[77] 〈劉廷翰傳〉，《宋史》，卷260，頁9025。

^[78] 〈李漢瓊傳〉，《宋史》，卷260，頁9020。

^[79] 《長編》，卷20，頁462。

認劉廷翰「先陣於徐河」，奪取橋頭陣地，當先破敵之功，是其受到本紀及相關史料特殊注重的主要原因。

除了崔翰和劉廷翰之外，沒有甚麼史料顯示其他將領可能成為鎮、定兩路屯軍的總指揮官。總上來說，滿城會戰前宋軍內部的指揮隸屬關係甚欠明朗。兩路屯軍之中，鎮州方面以雲州觀察使劉廷翰為駐泊兵馬都鈐轄，及彰德軍節度使李漢瓊為鈐轄，兩人中劉廷翰的指揮權多一「都」字，但李漢瓊官階較高，更有「便宜行事」之權。定州方面，殿前都虞侯崔翰和定武軍節度使孟玄喆都受命便宜從事。大抵孟玄喆身為亡國儲君而得用為大將，面對着灼手可熱的崔翰，恐怕只能規行矩步。然而太宗何以要製造這種表面的敵體勢均，仍是令人費解。至於從側翼逼近的關南屯軍，則指揮權比較清晰，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主將，部下有西上閣門使薛繼興，閣門祇候李守斌等一眾軍官。^[80]

總的來看，太宗自親征河東以來，到高粱河戰敗退出戰場，「天子自將」的階段已不得不告一段落。既然如此，他便應該重新任命一位戰區或戰役指揮官來統籌下一步的軍事行動，不管那該是攻勢還是防禦。然而在事實上，指揮權的移交非常含糊。這一方面也許是史料缺乏的緣故，但也不是毫無記載的。再看《長編》的記載：

戊子，次定州。……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軍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便宜從事。上謂諸將曰：「契丹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是日，車駕發定州。^[81]

這裏已經顯出，太宗在離開定州時對邊防部署所作出的調整中，並沒有任命一位最高的戰區或戰役指揮官，而讓李、孟和二崔四將互不隸屬。這樣做的效果不言而喻，就是把他本人仍留在最高指揮官的位置上。否則的話，他便不需要在任命的同時，又對作戰的手段加以界定一番。換言之，皇帝回去了，指揮體制卻維持在親征的模式當中。

宋太宗對前線指揮的干預是有兩個層次的。第一個層次是戰役的層次，其核心在於「當會兵設伏夾擊之」的構思。「當會兵設伏夾擊之」這句話也有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作為一個廣泛的戰役指導思想。在這重意義來說「會兵設

^[80] 〈崔彥進傳〉，《宋史》，卷259，頁9006。

^[81] 《長編》，卷20，頁457-458。

伏夾擊」顯示出典型的彈性防禦構思，要義在於集中兵力，尋找敵軍的弱點打。這種構思不但成為滿城會戰的指導方針，也貫串起日後雁門、羊山等成功的戰例。「當會兵設伏夾擊之」的另一重意義是具實指的戰役指導方針，具體實例為劉廷翰、李漢瓊、崔翰和孟玄喆等四將會師於徐河，而崔彥進則出黑蘆堤，沿長城口切入遼軍側後的部署上。這個兵力展開的部署，為日後的勝仗打下基礎。從這個層次上看，宋太宗的干預對戰役的發展是產生正面的影響的。

宋太宗對前線指揮的干預還有另一個層次，就是戰術上的干預。皇帝不在軍中卻頒下陣圖實行遙距指揮。「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82]這樣做的問題在於通常最高指揮官交給戰區或戰役指揮官的指令，單是界定任務本身已很足夠，不必對達成該任務的手段也加以界定，否則指揮官採取另類手段去完成任務時，便會變成一種違反命令的行為。楊億(974-1020)〈李繼隆墓志〉上說「朝廷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83]無疑是這種境況的最佳寫照。

據宋人記載，正在遼大隊騎兵源源而至的時候，右龍武將軍趙延進登高觀望敵勢，發現遼軍聲勢浩大，「東西互野，不見其尾」。而同時崔翰等卻正按太宗頒下的陣圖佈陣。「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趙延進看到這種情況，便向崔翰進言：「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矣。今敵勢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於辱國乎？」崔翰答以：「萬一不捷，則若之何？」趙延進馬上說：「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正當崔翰等尚在猶豫，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趨前說：「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於是崔翰等決意改排前後二陣，符合了趙延進「合而擊之」的構想，於是「士眾皆喜」。^[84]

以上這番對話有幾個重點。首先，趙延進揭示目的與手段的關係，指出太宗將戰術部署也界定在命令的範圍內所引起的不便。真正的作戰命令，按趙的說法，不外乎擊敗敵人而已，是否按照陣圖不必計較。況且太宗的陣圖也帶來兵力分散之弊，執行時有較大的危險性。總之，他的陳詞是站在戰術指揮官的立場上說的。可是李繼隆的說話卻不然，他是站在較為原則性的立場上說的。

^[82] 〈趙延進傳〉，《宋史》，卷271，頁9300；《長編》，卷20，頁462同。

^[83] 楊億，《武夷新集》，收入《四庫珍本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卷10，頁20。

^[84] 《長編》，卷20，頁462-463；〈趙延進傳〉，《宋史》，卷271，頁9300略同。

不受預定作戰計劃的束縛也確是他一生為將奉行的宗旨。後來君子館之役中的雪夜退軍，和唐河會戰的背城一擊，^[85]都是這種指揮性格的產物。崔翰的態度也值得注意。他對待趙、李二人的質疑，主要的反應是責任問題，而沒有在戰術的判斷上維護皇帝，也許在他心中，也不以太宗的八陣為然。從高梁河戰敗後，他在金臺驛單騎止潰一事，^[86]可知此人並非沒有膽色和威望。

宋方的記載說到排好陣，接下去就打勝仗了，沒有詳細說陣是怎麼排的。由於資料的缺乏，現在當然沒有可能完整無缺地將滿城之戰的陣勢再現，但從戰術層次來說還是可以初步解答兩個問題：(一)「前後相副」的重要性。(二)誰在前，誰在後？

第一個是佈陣的問題，以現實的觀點來看，陣是一種隊形。按照古典的兵法，陣有很多種類和名稱，如偃月、雁行之類，但是以佈勢的大致走向而言，可分橫向和縱向兩大類。橫向佈勢是指向左右兩翼展開兵力，縱向佈勢是指前、後方向編成一定梯次。^[87]縱向和橫向佈勢是野戰的基本戰勢，它們在歷史上的榮枯興替，與兵器、兵種，和指揮系統的演變息息相關。

橫向佈勢是較普遍運用的戰術。橫向佈勢有三個優點：首先，它佔領戰場空間較為方便，尤其是河岸、土坡、平原等。其次，它沒有很繁複的戰術動作，基本上要求部隊能夠做到橫向對齊，對於沒有嚴格協同訓練的部隊來說堪稱實用。在魏晉南北朝，對於臨時拼湊成軍的群雄而言，如高歡(496-547)，宇文泰(507-556)等，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北朝末年重要的戰役，如東西魏沙苑(537年)、河橋(538年)、邙山(543年)三戰，都作橫向佈勢。^[88]第三，橫向佈勢可

[85] 〈李處耘傳附子繼隆傳〉，《宋史》，卷257，頁8966。

[86] 〈崔翰傳〉，《宋史》，卷260，頁9027。

[87]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向心佈勢，即所謂圓陣。但圓陣主要用於防守，暫且不論。

[88] 《資治通鑑》，卷157，頁4884-4885：「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兵將交，丞相秦鳴鼓，士皆奮起，於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可謂橫陣側擊的典型戰例。約略同時的河橋會戰和邙山會戰中，橫向陣式都很常見。同書，卷158，頁4894-4896，載河橋會戰：「秦帥輕騎追(侯)景至河，景為陣，北據河橋，南屬邙山。……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同卷，頁4915-4917，載邙山會戰：「戊申、黎明、秦軍與(高)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明日，復戰，秦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於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秦與戰，又不利」。

將騎兵在兩翼展開，發揮其高度的機動性能，對擁有騎兵優勢的一方，最能發揮其優勢，以求從側翼迂迴或突破對方陣列。因此，它是隋唐時代最流行的戰術佈勢，唐太宗霍邑之戰(617年)就是其中典範。^[89]在安史之亂中，唐朝為了救平叛亂而借來的回鶻精騎也是用來充當側翼突破的矛頭，這從新店之戰(757年)可以看得出來。^[90]

將部隊按縱隊前後佈列，雖然在兩翼沒有很大的機動餘地，但是中央的主幹也相應增強了。從原理上說，這種陣勢的最大好處是：由於各部隊分列前後，並非一開始就全面投入戰鬥，指揮官可以根據戰情的變化，靈活地控制戰鬥的劇度——從前哨戰、主力戰，到投入預備隊，或者適時退出戰鬥。因此，進退皆便攻守態勢的轉換比較靈活是縱深梯次陣列的主要特點。許洞(約976-約1017)《虎鈴經》說：「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陣，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91]這就說出了中央突破戰術中「前後相副」的必要性。

第二個問題雖看似難於解答，其實並非如此。《宋史》記載這場戰役，在命名上頗有歧異，在不同的傳記上有時稱作徐河之役，或又喚作滿城之役，甚至有將戰場定在遂城的。這種歧異當然帶來很多研究上的不便，但只要小心考證一下，這種歧異卻恍然的成為解開謎底的關鍵。為甚麼同一場戰役在不同的傳記上出現不同的地名？在試想史料傳寫過程中出現的謬誤之前，首先應當想到不同的傳主或許正是在不同的地點或其鄰近地區作戰。也就是說，不應忽略從戰場地名的差異記載可以找到宋軍兵力部署的大致方位的可能性。

首先看第一組史料，《宋史》〈李漢瓊傳〉：「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鈴轄。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於滿城，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92]

《宋史》〈劉廷翰傳〉：「太宗北伐，既班師，上以邊備在於得人，乃命廷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縱兵南侵。廷翰先陣於徐河，……崔翰，李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眾於滿城」。^[93]

^[89] 《資治通鑑》，卷184，頁5748：「(李)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淵兵復振。」

^[90] 《資治通鑑》，卷220，頁7040：「郭子儀等與賊過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大敗」。

^[91] 許洞，《虎鈴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冊954，卷五，頁35-36。

^[92] 〈李漢瓊傳〉，《宋史》，卷260，頁9020。

^[93] 〈劉廷翰傳〉，《宋史》，卷260，頁9025。

《宋史》〈李繼隆傳〉：「後為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敗之於徐河」。^[94]

《宋史》〈太宗本紀〉：「鎮州都鈐轄劉廷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95]

這一組史料來自鎮州駐泊兵主將的記載。〈太宗本紀〉為何沒有提及崔翰等人，大概是因為劉廷翰從遂城發出的捷報最先抵達開封，史官馬上寫成日曆之類為修史預備的原始資料，因此變成側重劉廷翰的記載。最主要的是，從這組史料中我們看出順次排列的三個戰場：徐河——滿城——遂城，特別是〈李漢瓊傳〉「逐至遂城」及〈太宗本紀〉「戰於遂城西」兩處最為引人注目，皆指出遼軍抵抗終結的地點是在遂城附近。

第二組的史料則不然。《宋史》〈孟玄喆傳〉：「帥兵歸屯定州。俄契丹入侵，玄喆與諸軍破之徐河」。^[96]《隆平集》〈崔翰傳〉也說「破北虜於徐河」。^[97]《宋史》〈崔翰傳〉說得略為詳盡一點：「冬，契丹兵數萬騎寇滿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因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98]《宋史》〈趙延進傳〉「屯定州，遼人擾邊，……師次滿城，……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99]

這一組以定武軍及定州駐泊兵主將傳記構成的史料，大多只提及徐河，偶及滿城，卻完全沒有提及遂城。相反，卻涉及較大的斬級數字，除馬匹之外，還有牛羊、鎧甲、「所獲他物」的記載，而鎮州駐泊兵方面卻沒有。這意味着甚麼呢？很明顯，這種差異指出定武軍和定州駐泊兵在戰勝後花了不少時間來打掃戰場，而沒有追到遂城——縱使有，也是遠遠落在鎮州駐泊兵之後的。這樣看來，二陣「前後相副」的戰鬥序列便可以得出大致輪廓：前陣是鎮州駐泊兵，後陣是定武軍和定州駐泊兵所構成的。當然這是以主將的方位等同部隊的方位來做前提的，實際上可能有些出入，但在沒有更精確的資料前，這已經是我們所能作出估計的最大限度。

前後二陣的大致成分既已有些眉目，進一步看看其戰鬥力也不會太難了。

[94] 〈李處耘傳附子繼隆傳〉，《宋史》，卷257，頁8964-8965。

[95] 〈太宗紀二〉，《宋史》，卷4，頁63。

[96] 〈孟玄喆傳〉，《宋史》，卷479，頁13882。

[97] 曾鞏，《隆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17，頁657。

[98] 〈崔翰傳〉，《宋史》，卷260，頁9027。

[99] 〈趙延進傳〉，《宋史》，卷271，頁9300略同。

鎮州駐泊兵的設立是在太宗進軍幽州之前，其主將似乎也沒有參與高粱河戰役。李漢瓊多半是由於攻打太原時勇戰受傷。^[100]劉廷翰有參與早期邊境突破的行動，稍後的戰鬥序列中卻沒有他的名字。李繼隆也許是唯一打過高粱河戰役的將領，可是正如筆者在〈宋遼高粱河戰役考論〉一文所說，他的部隊是完整地撤退下來的。^[101]定州方面的情況則相反。定武軍節度使孟玄喆和定州駐泊兵的主將崔翰都是幽州回來的敗將，而趙延進在該役也負責督造砲具。我們固然沒有充分證據說定武軍和定州駐泊兵一定是殘兵敗甲，但從高粱河到滿城兩仗相隔不過三個月這點去看，宋軍以實力較完整的鎮州駐泊兵來充當突破矛頭，而繼之以定武軍和定州駐泊兵，這種戰術部署也是很有可能的。

《遼史》上說宋軍曾經請降，主將韓匡嗣誤信為真，於是宋軍的變陣出擊就構成了戰術突然性和局部優勢。可是宋方的記載並沒有提及偽降。其事真假也需要分析一下。這事在《遼史》韓匡嗣和耶律休哥傳上兩處都有記載，前者說「軍於滿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軍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噪薄我，眾蹙踐，塵起漲天」。^[102]後者則說：「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眾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矣。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噪疾馳」。^[103]

從這兩段史料可以看出幾點。其一，是兩軍在前一天經已交鋒，否則毋須說「翌日將復戰」。配合《宋史》說劉廷翰先陣徐河，繼而丁罕奪橋，可知這都是頭一天作戰的經過。但雙方主力似未齊集，沒有很激烈的戰鬥。其二，從「方陣，宋人請降」一語，可知這事發生在第二天決戰前佈陣的時候。弄清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正是宋將為排陣的問題爭辯不決的時候，而變陣也需要時間。在這樣一個緊要關頭，是應該盡量拖延時間的。所謂「兵不厭詐」，又或者說「強硬的軍事部署需要軟的外交政策來供給時間」，這種欺騙手段是非常需要的。宋方史料沒有提及這事不足為奇，反正既不怎樣光彩，也很難歸入任何一個大將的傳記，寫在本紀更是不行。不過奇怪的是連排陣的事也爭辯一番，宋軍中

^[100]〈李漢瓊傳〉，《宋史》，卷260，頁9020。

^[101]曾瑞龍，〈宋遼高粱河戰役考論〉，《大陸雜誌》，80卷3期（1990年3月），頁106-117。

^[102]〈韓知古附子匡嗣傳〉，《遼史》，卷74，頁1234。

^[103]〈耶律休哥傳〉，《遼史》，卷83，頁1299。

究竟有哪個夠分量的大將可以提出假投降，而不引起爭辯？這還是一個疑團。不過宋軍若為了爭取時間，則派出使者接洽投降很可能是在決計變陣之後。那時宋軍的戰役指揮部應已達成了共識，一切後果也分別有兩人「獨當之」了，進而發展出其他詔書所沒有規定的作戰手段，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始終沒有史料佐證，難以斷言。

宋兵一旦陣形排妥，便擂鼓發動攻擊。一時「塵起漲天」，一心望宋兵來投降的韓匡嗣嚇得呆了，竟然立刻就放棄會戰，下令撤退。《遼史》〈韓匡嗣傳〉說「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104]這句話會否言過其辭，雖難下斷語，然史臣確因其敗軍之辱，下筆甚重。反之，《遼史》〈耶律休哥傳〉說「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105]似是比較中肯持平的描述。《遼史》〈景宗紀〉記載此事也說「冬十月乙丑，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106]宋和遼交戰多次，《遼史》多不書敗績，除了這一次倒是例外，可見敗狀之慘。「眾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107]這支伏兵應該就是崔彥進的部隊，「崔彥進潛師出黑盧堤北，緣長城口，衝枚躡敵後」。^[108]遼軍敗走之後，被這支部隊夾擊，方才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其眾走易州山」，^[109]「敵眾崩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110]是役宋軍「俘斬萬計」，^[111]「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112]「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113]按照《遼史》，「耶律休哥收所棄兵械，全軍還」，^[114]否則遼軍的損失可能不止此數。此外，耶律抹只「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115]河東方面，耶律善補「以南京統軍使由西路進，善補聞匡嗣失利，斂兵還」。^[116]「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

[104] 〈韓知古附子匡嗣傳〉，《遼史》，卷 74，頁 1234。

[105] 〈耶律休哥傳〉，《遼史》，卷 83，頁 1299-1300。

[106] 〈景宗紀下〉，《遼史》，卷 9，頁 102。

[107] 〈韓知古附子匡嗣傳〉，《遼史》，卷 74，頁 1234。

[108] 〈長編〉，卷 20，頁 462；〈劉廷翰傳〉，《宋史》，卷 260，頁 9025 略同。

[109] 〈韓知古附子匡嗣傳〉，《遼史》，卷 74，頁 1234。

[110] 〈長編〉，卷 20，頁 463。

[111] 〈李漢瓊傳〉，《宋史》，卷 260，頁 9020。

[112] 〈太宗紀一〉，《宋史》，卷 4，頁 63。

[113] 〈崔翰傳〉，《宋史》，卷 260，頁 9027；〈崔翰傳〉，《隆平集》，卷 17，頁 657 略同。

[114] 〈韓知古附子匡嗣傳〉，《遼史》，卷 74，頁 1234。

[115] 〈耶律抹只傳〉，《遼史》，卷 84，頁 1308。

[116] 〈耶律善補傳〉，《遼史》，卷 84，頁 1310。

之」，^[117]可是對戰局也沒有甚麼幫助了。

滿城之敗對遼廷引起極大震動。「帝怒匡嗣，數之曰：『爾違眾謀，深入敵境，爾罪一也；號令不肅，行伍不整，爾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竄，爾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弗備，爾罪四也；捐棄旗鼓，損威辱國，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諸內戚徐為開解，上重違其請。良久，威稍霽，乃杖而免之」。^[118]其實深入敵境本來不算是罪，問題正是在於宋人採取彈性防禦的方針，實行迂迴夾擊，韓匡嗣又犯了幾個其他的錯誤，才導致這戰果。同樣耶律沙也幾乎被誅，最後獲得赦免。^[119]耶律休哥和耶律抹只敗而不亂，獲得賞識；前者「詔總南面戍兵，為北院大王」，^[120]後者「璽書褒諭，改南海軍節度使」。^[121]

與遼軍的失敗陰影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宋方大事論功行賞。崔翰為武泰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122]李漢瓊加檢校太尉，^[123]孟玄喆封滕國公，^[124]劉廷翰遷大同軍節度使、殿前都虞侯，^[125]趙延進遷右監門衛大將軍，^[126]李繼隆遷宮苑使、媯州刺史。^[127]崔彥進的遷賞不明。參與滿城會戰的大部分將官都得以升遷，很大程度上反映戰果的豐厚。

五、結論

本文借用現代戰略研究的概念——戰役，來觀察北宋對遼的邊防策略。分析的結果認為，縱使保守大戰略下也可能採用相對積極的戰略法，而這種戰略

^[117]〈景宗紀下〉，《遼史》，卷9，頁102。

^[118]〈韓知古附子匡嗣傳〉，《遼史》，卷74，頁1234。

^[119]〈耶律沙傳〉，《遼史》，卷84，頁1308。

^[120]〈耶律休哥傳〉，《遼史》，卷83，頁1300。

^[121]〈耶律抹只傳〉，《遼史》，卷84，頁1308。

^[122]〈崔翰傳〉，《宋史》，卷260，頁9027；〈太宗紀一〉，《宋史》，卷4，頁63。

^[123]〈李漢瓊傳〉，《宋史》，卷260，頁9020；〈太宗紀一〉，《宋史》，卷4，頁63。

^[124]王稱，〈孟玄喆傳〉，《東都事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卷23，頁390。

^[125]〈劉廷翰傳〉，《宋史》，卷260，頁9025。

^[126]〈趙延進傳〉，《宋史》，卷271，頁9300。

^[127]楊億，《武夷新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冊144-147，卷10，頁20；〈李處耘傳附子繼隆傳〉，《宋史》，卷257，頁8964-8965。

法在北宋彈性防禦的構想和實踐中顯示出來。宋軍在滿城會戰的勝利為彈性防禦的戰略模式打下基礎。此役宋軍以大部分兵力在正面拒敵，而同時以一部分兵力從外線迂迴敵後，實施前後夾擊的戰役方針。在日後很多戰役，如雁門、洪德城等戰役都可以看到其影子。滿城的複雜地形，特別是西山坑谷的地理特性，也為這次會戰的勝果埋下伏筆。宋軍在戰術上運用集中兵力突破的原則，以基本上完整的鎮州屯兵來做突破的矛頭，都是正確的對策。宋太宗應該慶幸他擁有一群特具質素的將官，敢於違反他的陣圖，且能靈活地變陣出擊。這些優秀的軍官對於宋太宗在戰役、戰術兩層次的干預能加以正確的分析，遵從戰役指導，打出部署，但對有問題的戰術則拒絕遵從。宋太宗的運氣也在於敵軍的主帥優柔寡斷，加速遼軍的失敗。可是宋軍此役首次出現了指揮權模糊不清的狀況，對於將來發生的協調困難，未嘗不是一個警號。